

倪南 著

易道演绎

从经验、观念到话语、图式

◎ 宗教文化出版社

易道演绎

——从经验、观念到话语、图式

倪 南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序

易学是中华文化之根本,易学体系广大而精微。几千年来,易学家有从象数方面对易学进行探索,有从义理方面对易学进行探索,有从图式方面对易学进行探索。因此,历史上将易学体系概括为象数与义理两大派,也有概括为象数、义理、图式三大派。现代,又有从科学易与人文易两方面概括易学体系的。这些概括,均有所依据,对易学研究都发挥了作用。

一、易学发展历程——易术、易德、易道

易学是以《易经》发其端绪的。《易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经典,它是由符号系统和与文字系统组成的一部完整体系,而符号系统应在文字系统之前形成,也就是说,在我国文字出现之前,就有了《易经》的符号系统。

《易经》产生于人之预测行动吉凶的需求,而预测吉凶是人之有目的活动的表现,人之行动有目的性是人之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之一。也就是说,从人之所以为人开始,其行动都有目的性,即行动之前都要预测其行动的吉凶。《易经》就是我国上古预测吉凶实



践中形成的一个预测系统。这一预测系统是由阴阳两个符号组成八卦,由八卦两两相重而成六十四卦,每卦六爻,计有三百八十四爻,构成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在长期的预测实践中,不断总结筮占的命中率而又形成卦辞、爻辞的文字系统。由符号系统与之相配的文字系统形成的《易经》,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也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易经》原初是用以筮占预测吉凶的,所以朱熹《朱子语类》中说:“《易》乃卜筮之书,古者则藏于太史太卜以占吉凶。”《周易》为筮占之书,但其中包含着道德内容。因此,孔子对《易》极为重视。他曾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最新考古发掘出帛书《易》中的《二三子问》、《易之义》、《要》等篇中,都记载了孔子与《易》的关系。帛书《要》中说:“夫子老而好《易》,居在席,行在囊”,这与《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的说法是相同的。当孔子的弟子对孔子老年喜《易》提出疑问:“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孔子在回答时指出:“我观其德义耳也”,说明孔子是从德义方面研究《易》的。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易传》中的道德思想是对易德的继承与发展。

《周易》中不仅包含着道德内容,还蕴涵着深刻的哲学思想。道家创始人老子揭示了《周易》的哲学内涵,从易道方面对《周易》作了新发展。

由此可以看出,《周易》的发展历程是由易术发展为易德、易道。

二、易学体系——易道、易德、易术

《周易》是由易术——易德——易道的发展历程逐步提升的。

易道是《周易》的最高层次,属于《周易》哲学的本体论;易德是《周易》的核心内容,属于《周易》哲学的价值论;易术是《周易》的应用部分,属于《周易》哲学的方法论。

易道——《周易》哲学的本体论

产生于战国时期的《易传》是对《易经》的阐释,《易传》中所阐发的易道——《周易》哲学的本体论与老子创立的道家哲学是相通的。因此,易道——《周易》哲学的本体论属于道家哲学。道家从道论的哲学高度,对《易经》中所包容的哲学内涵进行了揭示,这就是《易传》哲学中的本体论。

《易传》提出了“道”与“器”一对哲学范畴。《易传·系辞上》中说:“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的“形而上”,意谓有形可见的事物之上的东西,即无形的、抽象的东西,相对有形的、具体的东西而言。“形而下”,指有形可见的具体事物。有形的“器”之中,含有无形的“道”,无形的“道”是有形“器”的本体。道与器这一对哲学范畴,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围绕道与器这对哲学范畴,历代哲学家进行了长期辩论,提高了中华民族的哲学理论思维水平。

《易传》还从宇宙观阐发《易经》的哲学内涵,提出了一个包括天道、地道、人道的宇宙体系。《易传·系辞上》中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这与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中所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有着思想联系。在《道德经》中,道是天、地、人,亦即道是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的法则,而道是以其自身的自然而以为法则,道是最高范畴。

《易经》中虽然还没有出现阴——阳哲学范畴的表述,但——



与——两种符号是《易经》整个符号系统的基础。——与——两种符号代表着宇宙万物的对立统一关系,这一阴阳对立统一,深刻揭示了《易经》的辩证统一思想。《易传·系辞上》中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显然属于道家对《易经》中所蕴涵的阴阳对立统一辩证发展规律的揭示。道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本体,而且也是宇宙万物发展变化的总规律。《易经》中具有最高哲学范畴的道,显然来自道家哲学,也就是说,道家哲学以其最高哲学范畴释《易》,揭示了《易》中的深刻哲学内涵,将《易经》由占筮之术提升为哲学。

易德——《周易》哲学的价值论

“德”是西周初年周公提出的伦理范畴,孔子继承发展了周文化,建立了以仁与礼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系。孔子以德释《易》,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易传》各篇,皆贯穿着以德释《易》的思想。

《彖传》是对卦名、卦辞的阐释,贯穿着以德释之。如“大有”的“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

《象传》是对卦象、爻象、爻辞的阐释,贯穿着以德释之。其中释卦象的“大象”,皆为从卦象的象征,引发出君子的德行与事业,贯穿着孔子所说:“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如“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文言》是对“乾”、“坤”二卦所作的阐释,通篇贯穿着以德释卦的思想。《文言》以四德释“乾”的卦辞“元亨利贞”:“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贞”,反复以德释“乾”的卦辞。

《文言》对“坤”的以德阐释中提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善恶报应论，在中国伦理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系辞传》是对《易》的整体性阐释。《系辞上》中说：“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把圣人作《易》的主旨归结为“崇德广业”，并且提出：“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孔子指出善与恶是人之德行、事业成败的关键。他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系辞下》以德释卦：“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辨于物；‘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益’长裕而不设；‘困’穷而通；‘井’居其所而迁；‘巽’称而隐。‘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井’以辨义，‘巽’以行权。”

《易传》的《说卦传》进一步将易德与天道性命联系起来，指出：“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又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将易德上升为道德哲学。

易术——《周易》哲学的方法论

《易》本为筮占之书，易术是人们预测吉凶的方法。《易传》以



道释《易》，以德释《易》，也以术释《易》。《系辞上》中说：“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又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把占筮作为圣人之道之一。《系辞上》中保存了以蓍草占卦的“大衍之法”，这一筮卦方法，与龟卜以炙龟甲而自然呈兆不同，是通过数的推演求出爻变而成卦，表现出的是人谋。王夫之对两者作了比较。他在《周易内传·系辞上传》中说：“大衍五十而用四十有九，分二卦一，归奇过揲，审七、八、九、六之变，以求肖乎理，人谋也；分而为二，多寡成于无心，不测之神，鬼谋也。”又说：“若龟之见兆，但有鬼谋而无人谋”，说明《易》的筮占是通过数理的推演而成卦，表现了人的智谋，表明易术是人运用智能探求事物发展的规律以预测吉凶。

《系辞下》中说：“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又说：“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柔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说明《易》是古圣通过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以及人与万物，取象比类，而成八卦，八卦相重而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阴阳爻之刚柔相推而变动不居，显示吉凶悔吝。

《系辞下》探讨了《易》的变化规律，指出：“《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其初难知，其上易知；

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若夫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噫！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知者观其象辞，则思过半矣。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这是根据六爻所处的不同爻位而判断其吉凶。初爻代表事物的开始，上爻代表事物的终结，初爻难以判断，“其初难知，其上易知”。二爻与四爻的爻位不同，二爻处于下卦的中位，多誉；四爻处于上卦的下位，多惧。三爻与五爻的爻位不同，三爻处下卦的上位，多凶；五爻处上卦的中位，多功。表达了儒家中庸之道的取中原则。

取象比类，以类取，以类予是《易》的基本原则，通过卦象进行类比、类推来预测吉凶。《说卦传》对八经卦所代表的物象作了扩展，目的在于使之以更多的物象来进行类比推论，以预测吉凶。

《易传》中的易道、易德、易术三者是有机结合的。易道离不开易德、易术。如《系辞上》在“一阴一阳之谓道”之后，接着说：“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把易道与易德联系起来，易道是易德的哲学依据。易德有易道之哲学依据，所以说易德是周易哲学的价值论。接着又说：“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又把易道与易术联系起来，易道是易术的哲学依据。易术有其易道的哲学依据，所以说易术是周易哲学的方法论。

汉代以后，历代易学家根据时代的需要与自身的体悟，对易道、易德、易术进行新的阐发。我国古代科学家以《易》之道术为哲学依据，将《易》与天文、历法、地理、数学、医药学相结合，促进了我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政治家以《易》之道德为哲学依据，



将《易》与政治、经济、伦理道德、人文教化相结合,促进了我国古代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

三、从易道、易德、易术三领域发挥《易经》

由《易经》开其端,《易传》集其成,经历几千年发展的易学,其体系包括易道、易德、易术。历代易学家根据所处的时代与自身对《易》之体悟,对易道、易德、易术作出了各自的阐发。我们现代正处于新世纪的开端,应该适应新世纪的时代需要,发挥各自的创造力,从易道、易德、易术三领域发扬易学。

从易道领域发挥《易经》,即从哲学的本体论发扬《易经》。哲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道是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易道就是中华智慧的代表。从易道领域发挥《易经》就是进一步阐发《易经》中所蕴涵的智慧。《易经》是取之不尽的智慧宝藏,它的智慧是超越时间的,即不同时代的智者,皆可以从《易》中吸取智慧;它又是超越空间的,即不同国度的智者,也都可以从《易》中吸取智慧。《易经》传到日本、越南,他们的智者从《易经》中吸取智慧,促进了日本、越南的发展与进步。近代以来,《易经》传到西欧,受到社会学家、宗教家和自然科学家的重视,《易经》智慧给西方自然科学家以启示,对现代科学发展也起到了促进作用。现代经济学家将易学应用于管理,探讨易学管理模式。

新世纪是信息科学时代、数字化时代,《易经》符号系统的信息蕴涵,《易经》作为人类最早的运数思维智慧,对信息科学、数字化模拟的发展,也将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易的天人合一思维,对新世纪的人与环境和谐统一的发展,关

注环境保护,防治大气污染,维持生态平衡,使人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有很大指导意义。

易的整体思维,对新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对国家全局发展的宏观经济调控、对企业的整体管理模式以及人的全球化意识、整体意识,都将有其裨益。

易的变易思维,有利于人们适应新世纪的新发展,不断更新观念、更新知识、更新体制,以促进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经营创新。新世纪的发展日新月异,创新是新时代的特征。创新才能发展,而创新来自智慧。《周易》智慧必将在新时代发挥其作用。

从易德领域发扬《易经》,即从周易哲学的道德价值论层面发扬《易经》。道德是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以及人之德性自我建立的科学,属于哲学的价值论。道德是维护人类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是人生价值之根本。儒家把道德作为人的本质特征,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伦理为世界各国所关注。1993年世界宗教议会通过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宣言》的起草人德国神学家孔汉思在《序》中指出:“世界正处于这么一个时期,它比以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多地由世界性政治、世界性技术、世界性经济、世界性文明所塑造,它也需要一种世界性伦理,对于这一点,今天再没有人会加以怀疑了。这意味着,关于一些有约束力的价值观,不可改变的标准以及个人的态度,已经有了一种基本的共识。若无一种伦理方面的基本共识,任何社会迟早都会受到混乱或专制的威胁。若无一种全球性的伦理,就不可能有更美好的全球性秩序”,这充分说明了伦理道德对人类社会有序发展的极端重要性,而易德对新世纪全球伦理的发展将发挥积极作用。

从易术领域发扬《易经》,即从周易哲学的方法论层面发扬



《易经》。方法论与宇宙论是统一的,易术与易道是统一的。道术对中国天文、历法、地理、医药、数学、军事、政治、经济等都产生过重大的作用,在新世纪也将继续发挥影响。现代兴起的自然医学、环境学、管理学,都可以从易之道术中寻找智慧,周易与信息科学、周易与预测学、周易与自然医学、周易与生态环境、周易与企业管

理成为新世纪研究的热点,表明了易学的现代价值。

倪南博士研易十余载,这本《易道演绎》是他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完成的一部关于易道发生演化思想史的研究专著,适逢该书即将付梓,作为他在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指导教师,深感欣慰,特制此文以申祝贺之忱。

是为序。

李书有

二〇〇六年夏

内容提要

“推天道以明人事”是整个易学思想最基本的特征,天道为易道之体,易道为天道之用。“道”在易学思想的进路中经历了从经验、观念到话语、图式的一个发展过程,从历史发展的时间线索来看,这个过程主要是在殷商到西汉这段时期完成的,这是与中国整个思想文化的发育成熟期相一致的。在中国思想史的视域内,易学所体现的是一个独特的认知范式。两千多年来,历代思想家通过对由一系列符号和文字组成的《周易》的研究和阐发,逐渐建立起了一整套关于宇宙、社会乃至人生的观念和话语体系。这个体系以动态的、开放式的结构容纳了先人观察世界的多种视角,并因此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框架的主要的“元结构”。在这套话语系统中,《易经》、《易传》和《易纬》是三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核心文本。

易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和生命力并不



在于成为一种与儒、释、道相并立的独立的知识型理论体系，而是其思维方式所体现的超拔、灵动的智慧本身就是各家学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作为易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之一，“道”的思想具有多重复杂的结构。从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线索来看，它从经验、观念上升为话语、图式的演进过程本身既体现着先哲在思想深度上的开掘，又体现出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社会结构框架的建构理路。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社会性、历史性思想与文化互动的产物。在易学思想史中，从《易经》到《易传》，“道”的概念的明显转换具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折射出具有终极意义的“天”的观念逐渐摆脱旧有的宗教神学束缚而向理性化的认知转变，这种转变的最终结果就是将具“理”之“道”作为根本的属性赋之于“天”，使得“天”不再是一种外在的、绝对至上而又不可理解的神性实体，转而成为一个具有内在结构、容摄万物且可以通过特定方式加以体认的终极实在。这是一种全新的天道观，它的确立为重新界定天——人间的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观念支持。

从历史发展的脉络线索来看，作为一门学问的易学是通过《易经》占筮体例的解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中，立足于不同的视角而形成的义理之学和象数之学是两套不同的解释体系。从“推天道以明人事”这个易道的根本“法门”来说，以“象”、“数”为特殊符号形式和运算法则，以操作者个体的超常心智活动为根本运算机制，从现象“推衍”出某种可以决定现象变化方向和结果的规律性普遍原则，是象数易学的主要内容。从理论形态上看，义理之学更多地立足于这些认知的成果之上（当然其中也包括直接取材于实践经验的内容），进行人文意义上的发挥、推理，以获得更具一般普遍意义的对世界的解释，其根本的理性诉求在于“明人

事”，即对“人事”的规范或曰“人道”的构建。而象数易学的焦点始终“定格”在对“天道”的揣摩和模拟上，虽然“明人事”也是其现实的功利诉求，但这一诉求的对象往往只是个别性、个体性的祸福兴衰，所以其思想价值也更多地通过对“天道”之“推”的过程来体现。虽然象数易学特别是与之相关联的各种方技数术更侧重于对世界的“了解”过程，它们在“解释”世界方面也有着鲜明的特色，与义理之学注重理性的陈述相比，象数易学最突出的特点是观念的形式建构，这既是“推”的运演工具，也是所“推”之“天道”的呈现方式。在易学的成熟形态中，各种形制的图式是易学构架的基础单元，易道的义理陈述也是由此而发轫。这些图式往往有着复杂的起源，其中的核心部分与上古的巫术操作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源自于巫术的许多认知逐渐向知识转化，这些图式也在自身的不断完善过程中由“独知”向“共识”转型。这个转型的过程从文献遗存来看，集中发生在春秋战国特别是秦汉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易学的发展路向经过反复的冲突和选择初步确定，后世思想发展赖以扩张的基础资源也基本积蓄完成。从结果来看，一些图式由于无法调和其中固有的“独知”与“共识”的矛盾而退出话语的主流，另一些则完成了“共识”化的建构而成为此后理论建设的基础并且在历史的过程中渐渐沉淀在社会文化之中，成为整个民族精神世界的基本框架和理念预设。

尽管在“道”的范畴中“天道”与“易道”两个概念在原则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但以“弥纶天地之道”为宗旨的易道显然更具主体性认知的色彩。作为易道核心内容的阴阳思想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论。换言之，它既是“了解”世界的手段，也是“解释”世界的理念。如果将“易道”简单视为文本中的一个词汇和符号，受语言本身的局限很难将其与人的心智联系起来，一番梳理所



能得到的结果只能是平面化的知识性片段,然而如果将这些片段串联起来,却也可以透过现象化的表层线索窥测到心智本身的发展理路,这个理路在《易经》——《易传》——《易纬》三个核心文本的思想承续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显著。这是一个认知从初级的经验到观念再到高级的话语陈述和图式摹形的过程,也可以视作是“易道”在主体思想中发生、发展的基本过程。所以,就易学所蕴含的思维模式而言,这样的过程对其形成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这一过程也折射出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话语权力与话语的言说者之间存在的微妙的张力变易。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以具象和直观思维为典型特征的象数思想所构造的以“象”为基本元素,以“数”为基本法则的认知结构是一个以关系实在为核心内容的世界的图式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所有的结构单元和关联法则都是变动不居的,无论是“象”还是“数”都具有相当宽泛的外延而没有严格而绝对的界定。尽管阴阳、八卦以至于五行分别给出了这个结构下事物的基本类属性,这些属性在事物不断的运动变化中又并非一成不变,而且常常需要通过与其他事物发生关联才能得以显现某种暂时的规定性,所以它们并不具备现代认识尺度下的“概念”的意义。究其原因,乃是在这个认知结构中,所谓的认知“主体”始终是与“客体”相互关联、相互规定的,即《易传·系辞》所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因此,在这个结构中的世界图式就不是一个“绝对”、“客观”的外在图像,而是一个具有浓厚“主体”色彩的“画境”。所以,这样一个具有很强主观“独知性”的认知结构很难被划归通过实证和逻辑推理构造出来的,以广泛“共识”为基本属性的社会性的理性知识框架体系中。

在易学的范畴中,两汉的象数理论借助阴阳五行的结构图式

和天文律历的相关知识完成了对筮法的改造,创造出可以通过形式的运演而推算未来的新占法。由于这些占法借用了易卦的卦象符号和相关的筮数原则,故而也被纳入到易学的体系之中,从而极大地扩展了易道的形式结构,使其“真正”“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并进而成为天道的体现形式。然而这种试图将易道完全形式化的努力的最终结果是“入于机祥”,成为一套牵强附会的繁琐哲学,其症结就在于形式化的共识建构对于其成立条件的强烈依赖。形成这种思想困境的根本原因是“识”与“智”的矛盾冲突,外在的、来源于他人之知的知识只有通过实践的内化才能转化为内在的自知。虽然知识只是智慧的一种有限的形式存在,是以各种内容的事物之“理”——有形之则作为其终极归宿,但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它为实现向智慧的超越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和起点。因此,知识可以被视作是一种“有形之道”,是进入澄明之境的切实可行的路径。只有寻“理”而不执于“理”,方有可能实现由知识之“理”向智慧之“道”的飞跃,即“转识成智”。